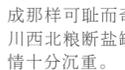


笔尖下的红军壮丽史诗——

范长江西北之行

■ 高中华



人物

1937年2月,范长江历经艰险终于抵达延安,成为国统区较早到达陕北的记者。在这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范长江,这位心怀天下、目光敏锐的新闻人,毅然决然来到西北,开启了一段意义非凡的征程。这一趟西北之行,不仅是他个人生涯的重大转折,更如同一束强光,穿透国民党严密的新闻封锁,让外界得以窥见红军的真实面貌,成为一场意义深远的“文化长征”,而他本人也在这漫漫征途中,完成了从记者到认同者,直至成为一名共产党员的转变。

二

范长江有着敏锐的观察力,也有着深厚的军事素养。他时刻关注红军的军事动向,深入红军活动区域,探寻那些被国民党刻意掩盖的真相。在甘肃迭部,他得知红军“不压迫番民”的政策,暗自赞叹。

范长江翻山越岭,克服重重困难,深入藏区,终于见到了土司杨积庆。杨积庆对国民党愚弄欺压藏人的做法一向不满。他从范长江这里了解到红军的事迹后,对红军好感倍增。后来,杨积庆暗中派人与红军取得联系,表示愿意帮助红军。特别是当他得知红军粮食奇缺,正靠吃草根树皮充饥后,更是对红军产生了同情,立即给自己的部队下令:不要打、不要抢红军,给红军开仓放粮!

兰州城内,范长江奋笔疾书。1935年9月,通讯《岷山南北“剿匪”军事之现势》发表了。他对红军长征的背景、动向及国民党军队的战略部署进行了深刻剖析。他大胆预言红军北上抗日的决心与路径:“最多不出一月之内,即将具体表现。设洮夏两河被突破,更被进入甘凉肃三州,则中国之国际与国内局势,将发生根本影响。”他用自己的笔触描写红军将士在极端恶劣环境下的坚韧与不屈:“夜间宿营,尤为痛苦,上有不断的雨水,下系丝毫不遮垫的稀泥地。站立尚且被陷入,要睡又何从睡起?不得已的办法,系将草地上的草割了下來铺在泥上,勉强躺下……到了夜间,风雨交加,下面潮湿又透草而过,全身战栗,冷彻心肝!”真是一段令难以忘怀的人间跋涉历程。在那个国民党严密封锁消息的年代,范长江的报

道犹如一声惊雷,打破了长久以来的沉寂。他以新闻记者的敏锐,结合地理环境与国民党军队的部署,对红军的行进路线作出了预测。他分析,红军“最有利的出路,是北入甘肃”“虽尚未可知,可依记者观察以趋洮夏两流域的可能最大……”他判断红军战略转移的目的是北上抗日。红军也并非像国民党宣传的那样已损失殆尽,红军估计还有“万人”。后来中央红军果然选取了过草地、越岷山、突破腊子口、北进甘肃,经陇东到达陕北这条路线。这一判断与历史进程竟然高度吻合。

范长江的报道,独树一帜。他以客观的笔触,还原了红军的真实面貌,打破了国统区的谎言,向社会大众公开了红军的真相。他的报道如同一股清流,滋润了许多人干涸的心田,让全国人民看到了红军的正义与英勇。1936年8月,这些通讯汇集成《中国的西北角》一书,并公开发行,出现了读者抢购潮,数月内多次再版。胡愈之赞誉之为“震撼全国的杰作”。该书比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要早1年多。它打破了国民党散布的红军即将被“消灭”的谎言,为红军引来了亿万双关注的眼睛,把社会民众心中的希望之火燃得更旺了,也引发了外国记者对共产党和红军的兴趣,甚至后来冲破国民党封锁去西北寻找“红军”。

三

在西安新城有座宫殿式的小楼,灰瓦覆顶,木质门窗上红色油漆显得古色古香。这就是当年的杨虎城公馆——西安事变指挥部。西安事变刚刚和平解决的时候,国内外许多爱国人士不了解事变真相。范长江克服重重阻力来到西安。周恩来在这里向他详细介绍了西安事变的经过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1937年2月6日,范长江离开西安,乘车前往延安。当他踏入这片土地的那一刻,就被眼前的景象深深吸引:黄土高原上,人们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充满着对未来的希望,从当地群众那里听到了红军帮助他们摆脱苦难的动人故事。

他感受到了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朴实与谦逊,认为他们都是见识渊博、通情达理的人,称毛泽东“书生一表,儒雅温和”;朱德“已有五十多岁了,

而面目仅有四十岁人之健壮”。毛泽东与他的彻夜长谈更让他醍醐灌顶,解决了多年来苦苦探索和追求而又无法解答的中国前途问题。在那间简陋的窑洞里,灯光摇曳,毛泽东侃侃而谈,从中国的国情到革命的前途,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到人民的力量,每一个观点都让范长江深受启发。他认真聆听着,不时提出自己的疑问,毛泽东都耐心地一一解答。这次长谈,如同黑暗中的一盏明灯,照亮了他前行的道路。他称:“延安的访问,结束了我十年来在政治上辛辛苦苦摸索的历史。”

随着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了解的深入,范长江的思想逐渐发生了转变。他目睹中共与群众的血肉联系,感受到一个与国统区截然不同的世界:在陕北,这里没有剥削和压迫,人民当家作主;干部与群众打成一片,共同劳动生产;军队纪律严明,秋毫无犯。这些都让他内心深受震撼。

从此,范长江便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投身新闻报道工作。他不再仅仅满足于记录事实,更希望通过自己的笔,为抗战呐喊、为真理发声。他离开延安后,撰写了《动荡中之西北大局》,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当天发表。文章报道了西安事变的真相并宣传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与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的关于西安事变的报告完全相反,一时轰动全国。同时,他深入前线,采访将士们英勇作战的事迹,将他们的故事传递给全国人民,以此激发广大民众的爱国热情和抗战决心,用自己的行动诠释着对红色信仰的认同与实践。

在不断的实践与探索中,范长江对共产主义的信仰愈发坚定。他看到了中共在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看到了我军将士们为了民族解放事业不惜牺牲一切的崇高精神。他深知,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带领中国人民走出困境,走向光明。

1938年,因与《大公报》存在分歧,范长江毅然离开,并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创办国际新闻社,团结国统区进步记者,宣传中共主张。1939年5月,在周恩来的介绍下,范长江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多年的追求与探索终于有了归宿。入党后,范长江全身心投入革命事业,写下大量战地通讯,激励军民斗志。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于是,他冒着生命危险,原路返回,终于在草丛里找回了油壶。战友们都说他是“一根筋”。他背好缝纫机,笑了笑说:“这是我的武器,也是我的战友,它比我的命还重要啊。”

那台缝纫机,被葛接调爬雪山、过草地时扛着、挑着。一有空闲,他就为战友们缝补衣服。1935年,部队到达陕北。军营里,又能听见葛接调的缝纫机“哒哒”的响声。不久,葛接调接受了一项光荣任务——给毛泽东同志做棉衣。他接到命令后,就为毛泽东量了尺寸。当棉衣做好送去时,正赶上直罗镇大捷,毛泽东把棉衣穿在身上连说:“好!好!谢谢你呀!”这也是葛接调一生中难忘、最幸福的时刻。

新中国成立后,有关部门的同志拿着一张照片来找葛接调求证,看照片中毛泽东同志所着棉衣是否为他做的那一件。葛接调说:“我到陕北后,确实为毛主席做了棉衣,但照片上的这一套是不是我做的,时间太久了,记不起了。”对方请葛接调再仔细看看,葛接调说:“确实不记得了,我不能瞎说。”对方只好离开,他们心中留下了一位忠厚诚实的老红军战士形象。

2020年5月,葛接调的儿子葛江洋从沈阳回到于都,我们跟随他将葛接调的雕像安放在他的家乡葛坳牛颈村祖居前。我们为老红军献上鲜花,深深鞠躬。那一刻,我仿佛与那段峥嵘岁月有了真实的触碰。同时,他将父亲生前的珍贵物品都捐给了纪念馆。我忍不住问他:“为什么要把父亲的物品都捐赠到于都?”葛江洋说:“我父亲是于都人,他一直惦记着家乡。他过世了,遗留下来的东西,我一定要送回于都。”听到这番话,我心里满是敬意与感动。我深知,这不仅是一个儿子对父亲的怀念,更是一份红色记忆的传承。

1936年1月的陕北,寒风如刀,卷着鹅毛大雪掠过黄土高原的千沟万壑,一杆烟的工夫就把贫瘠的土地包裹得严严实实。天地间白茫茫一片,低矮的窑洞在风雪中显得更加苍凉。这是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后的第一个春节。经过万里长征的将士们,终于在这片土地上觅得一处落脚之地。此时,红一方面军却面临着比严寒更刺骨的困境——根据地面积小,给养已极度匮乏。林伯渠在日记中写道:“战士面有菜色,棉衣十之八九已破,棉花外露,以草绳束腰御寒。”

毛泽东同志的案头,一边是堆积如山的军情电报,一边是亟待解决的供给难题。1月10日,农历腊月十六,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东征山西的方针和准备工作。腊月的陕北,空气中已隐约透着年味,零星的炮仗声从村落深处传来,却驱不散红军总部的窘迫。毛泽东思忖良久,提笔写下一封信,向红15军团长徐海东借钱。

徐海东接到信时,正率部驻守陕北。当经理部长向他报告,全军仅有7000块大洋的积蓄时,他没有丝毫犹豫,当即下令:留下2000,拿出5000块送中央!几天后,这笔沉甸甸的大洋被专人护送,穿越风雪送到了中央。多年后,毛泽东提及这件事,说在陕北最困难的时候,多亏了海东同志借给我的5000块大洋,那可是为革命帮了大忙啊!这笔“雪中送炭”的资助,不仅解了红一方面军的燃眉之急,更用行动践行了“革命一家亲”的信念,让团结的暖流在寒冬中涌动。

17日,北方小年。总政治部召开军民联欢会,舞台是用木板临时搭起来的,幕布由几床被单缝成。宣传队员李伯钊领唱《八月桂花遍地开》,唱到“红军来了晴了天”时,台下战士和群众齐声应和。演出中途,侦察兵送来紧急情报:东北军一部正向我根据地移动。演出照常进行,但警卫部队已悄然进入戒备状态。

24日,农历大年初一,远处响起零星星星的炮仗声,打破了高原的寂静。

26日,农历大年初三,夜幕降临时,毛泽东、张闻天等抵达延川县,住进老乡家的窑洞里。窑洞里,老红军烧旺的柴火驱走了些许寒意。将士们不顾疲惫,主动帮老乡打扫院落、修补门窗,用生硬的陕北话与乡亲们拉家常。这份鱼水情,让寂静的山村夜晚格外温暖。

31日,农历正月初八,毛泽东在延长县主持召开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会议,进一步讨论东征战役问题。东征的提议一经提出,便引发激烈争论。红军好不容易在陕北找到落脚点,还没待喘口气,又要东渡黄河,大家都心存顾虑。即便拥护决策的彭德怀,也提出要“绝对保证同陕北根据地的联系”。毛泽东采纳了彭德怀的建议,强调“一定要保证黄河各渡口在我手中,使我进退有据”。会议最终作出决定:成立“中国人民红军抗

一九三六年陕北的春节

■ 孙彤

日先锋队”,由彭德怀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择日东渡黄河。

2月上旬,陕北恰好下了一场大雪。毛泽东心情极好,极目远眺,千山万壑被白雪覆盖,天地间一片苍茫壮阔,他挥笔写下《沁园春·雪》。

2月20日,夜幕笼罩下的黄河渡口,冰凌闪烁。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队强渡黄河,将士们斗志昂扬。行军的火把连成一条蜿蜒的光带,向着历史的下一个关口迤迤而去。点点火光,比任何节日的灯笼都更明亮,因为它照亮的是一个民族浴火重生的黎明。

1936年陕北的春节,就这样在风雪、戒备中度过,信仰的火种在山路上、军民之间悄然传递,孕育着改变中国革命航向的力量。窑洞的灯光、黄河的凛冽、《沁园春·雪》的豪情,共同构成那段峥嵘岁月的生动注脚。

古城北平新生从新春开始——

人民子弟兵庄严入城

■ 位辉婷 于洋

★ 军史撷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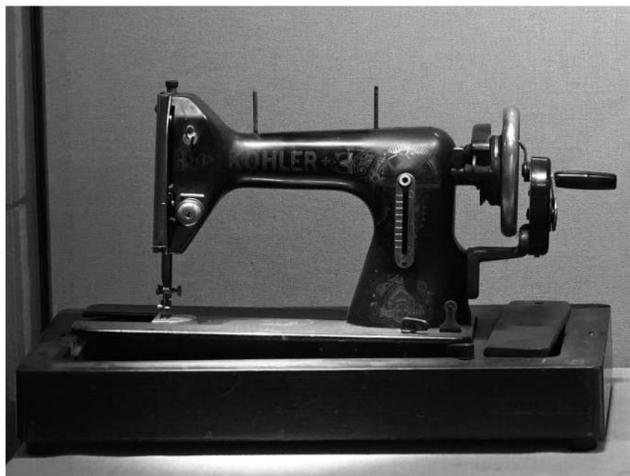
1949年1月28日,农历除夕,寒气袭人,在北平城外的阵地上,解放军官兵依旧坚守岗位。他们耳边没有了枪炮轰鸣,唯有城内零星的爆竹声随风飘来。

一周前,傅作义正式宣布接受和平改编,北平和平解放的大幕徐徐拉开。为了让战争的炮火声中度过了许多不眠之夜的北平人民群众安安静静、痛痛快快地过一个农历年,聂荣臻提议人民解放军的进城日期推迟两天,即1月31日入城。推迟进行的防务交接,是我军优良作风的现实注脚,也是人民子弟兵亲民爱民的生动写照。

29日,大年初一,北平西北部昌平县的战壕里,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9兵团一机炮连斗志昂扬。几天前,他们和兄弟部队一起包围了北平城。那段时间,他们昼夜不停地挖战壕、修工事。初一这天,指导员李跃进站在战壕上对战士们说:“今天是大年初一,是举家团圆的日子。为了打倒蒋介石,我们在战壕里过年,别有一番情趣。过年可别忘了打仗,这叫战斗过年两不误。”31日,大年初三,傅作义部全部开出北平城,接受改编,北平宣告和平解放。我军人

一台缝纫机的长征

■ 谢薇



葛接调的儿子葛江洋捐赠的缝纫机。

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藏

纫机。此后,这台缝纫机便成了他亲密的战友。

长征途中,每到宿营地,葛接调都要仔细检查缝纫机是否完好,拿出油壶给缝纫机上油,再用一块油布将缝纫机严严实实包好,以防行军途中遇

水生锈。

过湘江不久,葛接调突然发现油壶不见了。他焦急万分,要返回寻找。战友们劝他算了,敌人正在后面追赶,回去太危险了。葛接调说:“没有油壶,缝纫机就不能用了,还怎么完成任务呀?”

★ 我是讲解员

在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的展柜中,有一台德国产的“飞人牌”手摇缝纫机。透过它斑驳的纹路,我们依然能窥见烽火岁月里的温暖与力量。90多年前,于都籍红军战士葛接调就是挑着这样一台缝纫机,踏上了长征路。我是土生土长的于都人,也是在纪念馆工作了10年的讲解员。这台缝纫机于我而言,早已不是一件普通的文物,而是一位承载着红色记忆的“老伙伴”。

葛接调家境贫寒,7岁那年被送到城里的裁缝店当学徒。尽管他后来学有所成,在当地小有名气,但依然被地主豪绅欺压。于是,他动员村里的青壮年参加赤卫队,与地主恶霸作斗争。1929年,葛接调加入红军队伍。在攻打汀州时,他冲锋在前,身上多处负伤。战斗结束后,他被评为“汀州五勇士”之一。养伤期间,他听说红军打下汀州后,接收了几台缝纫机和一批布匹,还建立了被服厂,正四处招收缝纫工人,为部队赶制军装。他主动要求参加。长征出发时,他被分配到中央纵队缝纫班工作,领导交给他一台德国“飞人牌”手摇缝

一家外国通讯社当天从北平发出的电文称:“中国人民解放军入城,规模空前未有,士气十分高涨,实为强大有战斗力的部队。北平百姓则称赞道:“这才是咱们人民的队伍!”

本版学术支持:褚银